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2 月 21-25 日)

1、《外交学人》：澳大利亚在无有效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投入使用人工智能

12 月 13 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迪肯大学法学院网络安全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杰森·兰切克（Jayson Lamchek）的文章《澳大利亚在无有效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投入使用人工智能》。文章认为，澳大利亚计划在公共服务领域试行微软 365 Copilot 软件，成为全球首批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之一。365 Copilot 软件采用类 ChatGPT 的机器学习架构，存在“幻觉问题”。作者表示，广泛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破坏对科学信息的信任，丧失批判性思维。在政策层面，尽管澳推出自愿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但澳没有类似欧盟或中国详细的人工智能法规，只有新南威尔士州设有审查委员会。澳政府鼓励但不强制政府人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近期，人工智能监管的国际发展也对澳人工智能政策提供参考。拜登颁布的人工智能行政令利用政府市场和监管权力，规定了超过 GPT-4 能力的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上报职责。失业情况、国家安全风险、歧视和虚假信息等威胁亦使得人工智能的部署变得更加谨慎。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2/australia-leaps-into-ai-without-a-working-safety-net/>

编译：刘嘉雯

2、《福布斯》：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四大挑战

12月20日，《福布斯》网站刊登软件公司 Apriorit 副总裁克劳迪娅·扎伊卡（Klaudia Zaika）评论文章《人工智能应用需应对的四个基本挑战》。文章指出，人工智能为企业带来减少雇佣支出、提高产品个性化程度、优化内部流程等利好，但也引发以下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时必须应对的挑战。首先，企业需要大量且高质量的数据。数据量不足、数据标记不准确、数据重复性高等情况，或含有个人隐私的数据都可能造成人工智能偏见，引发道德或法律问题。其次，企业需要精通人工智能的专业团队。企业需要一支在数据科学、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具有强大专业知识的原创团队，以确保其训练出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符合企业复杂的商业需求。第三，企业需要确保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性。企业不仅应该确定其代码与算法是无偏见的，还需要对模型进行大量测试，并采用加密和访问管理机制，进而确保其人工智能模型不会因外部攻击或恶意访问导致数据泄露。最后，企业应对人工智能的集成方案和未来进展进行规划。企业应努力将人工智能融入企业经营的全部流程与方案中，同时随着硬件性能进步与数据质量变动对模型进行微调，使其可以应对

全新的数据与任务。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techcouncil/2023/12/20/four-essential-challenges-to-be-prepared-for-when-adopting-ai/?sh=6e6858c43b80>

编译：高隆绪

3、《报业辛迪加》：监管人工智能不足以减轻技术风险

12月19日，《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刊登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文章《如何预防人工智能灾难》。文章表示，尽管技术乐观主义者赞扬人工智能重塑世界的潜力，但必须减轻这些新工具给社区和人类带来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加剧了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专家学者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毁灭世界的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符合人类价值观。限制可能有害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供应，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对自动驾驶汽车和面部识别等新兴技术实施严格的监管来做到这一点。这种方法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在道德相对主义为常态的世界中，很难就什么构成伤害达成共识。由于越来越不清楚谁“拥有”被视为有害内容，因此很难让供应商或提供商承担责任。此外，规范技术使用的尝试往往来得太晚。控制人工智能的第二种方法是完全限制潜在危险产品

的开发。但抑制需求比限制供应更为复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商业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力量使得放慢技术创新变得极其困难。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仅仅监管人工智能是不够的。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luddites-today-not-wrong-about-artificial-intelligence-by-robert-skidelsky-2023-12>

编译：和怡然

4、RSIS：国际社会必须防止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12月14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网站刊登该机构研究员卡里尔·金·萨贡·特拉哈诺（Karryl Kim Sagun Trajano）的评论文章《国际社会必须防止全球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文章认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国际制度监管、治理人工智能，以防止大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领域出现类似冷战时期关于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文章强调人工智能既有潜在深远利益，也有巨大风险的双面性。作者呼吁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以避免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此外，作者强调有必要为人工智能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框架。鉴于当下人工智能主要由私营企业开展商业及运营，各企业对各自的人工智能技术测试具有隐蔽性，监管人工智能面临多重挑战。文章强调了全球协作在促进人工智能积极发展、应用方面的必要性，包括

确立共同的道德准则与公共问责制度。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cens/we-need-to-prevent-a-global-ai-arms-race-now/>

编译：赵金钰

5、布鲁金斯学会：应尽快制定政策框架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 2024 年美国大选的影响

12 月 11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杜克大学科技政策中心负责人马特·佩罗特（Matt Perault）和该中心高级政策助理斯科特·巴布瓦·布伦南（Scott Babwah Brennan）共同撰写的文章《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广告中应用的政策框架》，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广告中的潜在危害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文章主要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技术政策中心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进行分析，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广告中使用的危害部分被夸大，而另一部分则被低估。目前证据显示，政治广告对于选民观点的影响力并不强大，也没有证据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改变这一点。然而也有学术文献指出，规模较小、下游的选举可能更容易受到政治广告影响，且人工智能生成的政治广告也可能会放大偏见。尽管政策制定者已经做出回应，比如提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强制添加水印、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政治广告中加上免责声明、直接禁止政治广告中的欺骗性生成内容等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尚未可知。

文章围绕两方面提出建议：一是政策应针对选举危害而不是技术，二是促进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治广告中应用的了解。最后文章强调，随着 2024 年选举的临近，一个减少风险、填补空白的政策框架迫在眉睫，必须确保创新技术服务而不是破坏民主程序。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policy-framework-to-govern-the-use-of-generative-ai-in-political-ads/>

编译：李一磊

6、《经济学人》：欧洲应致力于制定更严格而非充斥例外的 AI 法案

12 月 10 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文章《欧洲在人工智能方面落后，在监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文章认为，欧洲《人工智能法案》的目标是通过规范 AI 工具的应用以保障其合理使用，而不是规范其构建方式。AI 法案早期的关注点是规范各种 AI 工具的应用，欧洲议会希望对如 ChatGPT 的大型语言模型（LLMs）进行规范，要求制造商公开训练数据和评估模型风险的方式。最终妥协是对最强大的语言模型实施更严格的规定，对小型模型尤其是对开源模型则存在一些例外。另一个争议焦点是执法机构是否应被允许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欧洲议会主张全面禁止以保护隐私权，而一些国家则坚持认为他们需要这项技术来确保公共安全。最终妥协是设立一系列例外情况，例如实时面部识别仅在某些犯罪行

为、特定时间和地点以及经法官或类似权威批准时才允许使用。然而，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相比，AI 法案尚未成功，欧洲议会仍需解决一些重要细节，以及批准最终版本法案。因为欧盟是一个由独立的欧洲多国建立的联盟，这可能导致对规则的不同解释和执行不力。最后，文章认为 AI 法案可能无法触发像 GDPR 那样的“布鲁塞尔效应”，因为 AI 领域的激励机制不同，可能会导致在欧盟内使用不同算法以符合规定的情况。此外，当 AI 法案完全生效时，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制定了自己的 AI 法案。尽管 AI 法案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技术风险及应对措施，但欧洲可能更应该致力于制定一项更为严格，而非充斥例外的 AI 法案。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3/12/10/europe-a-laggard-in-ai-seizes-the-lead-in-its-regulation>

编译：石佳怡

7、CSIS：美印创新伙伴关系的战略融合

12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振兴美国创新”项目研究员友重英树（Hideki Tomoshige）的文章《美印创新伙伴关系的战略融合》。文章认为，基于经济互补性和战略目标一致性，当前美国与印度的创新战略正进一步融合。美印在创新合作方面主要有以下进展：一是加强敏感领域的技术开发合作。目前两国已签署联合制造飞

机发动机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美正向印进一步开放先进国防技术的合作领域，并减少先进设备出口的法律障碍。二是合作推动私营部门的投资。印度政府通过补贴、降低壁垒等方式鼓励美企在印投资，当前美企在印投资已稳步上升。三是构建一系列创新合作框架，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产业合作。包括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印美战略贸易对话（IUSSTF）等。双边主要在半导体、电信、量子技术等领域展开合作：半导体产业方面，美光、泛林、应用材料、谷歌等美企已宣布在印进行大额投资。电信方面，印已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进入印市场，并与美方组建 5G/6G 开发联合工作组，加强在研发和测试等方面的合作。量子技术方面，美印通过“量子纠缠交换项目”，促进两国学生、研究人员等交流。美印科学技术捐赠基金（USISTEF）启动一项 200 万美元的赠款计划，支持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联合开发和商业化。作者认为，当前美印两国都在努力振兴国内制造业、创造高价值就业，加强创新体系合作有助于两国互利共赢，实现各自战略目标。

<https://www.csis.org/blogs/perspectives-innovation/strategic-convergence-us-india-innovation-partnership-0>

编译：雷文聪

8、《外交事务》：欧洲须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

12 月 22 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德国联邦议院及其

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的文章《欧洲须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作者认为，随着对乌克兰主要援助方案遭到匈牙利和美国共和党政策制定者的阻止，支持乌的西方联盟显得越发软弱和分裂。西方政策制定者须修改支持乌克兰的办法。对此，乌的合作伙伴应转向采取全力以赴的进攻战略，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一切必要武器以击退俄军。欧洲应做得更多，包括从欧盟应提供更多的物资、促进军事生产以及扩大各国的生产能力。具体来说，向乌提供更多的中程和远程巡航导弹，使其能够瞄准被占领土上的俄基础设施，同时保护士兵免受前线危险；加快扩大向乌交付 F-16 战斗机使其建立空中优势；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使其向俄军队有效施压并在战场上占据上风。在当前情况下，强迫乌克兰谈判将摧毁乌与西方更紧密结盟的希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europe-must-ramp-its-support-ukraine-rottgen>

编译：李达镐

9、《印度快报》：印度经济增长前景的动力

12月19日，《印度快报》发表汇丰银行（HSBC）首席印度经济学家普兰朱尔·班达里（Pranjul Bhandari）的评论文章《印度经济增长前景的动力是什么》。文章指出，印央行将印度 2023-2024 财年 GDP 增速预期升至 7%，主要原因在于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数字基建组成的“新印度”经

济部门的成果。近年来，“新印度”发展迅猛：一方面印信息服务能力跃居全球前列；另一方面印数字基建能力有效促进其初创科技公司快速发展，并吸引大量外国投资。然而，“新印度”的发展依然受到较大挑战——如果无法推动制造业、农业等“老印度”经济部门完成改革，“新印度”就无法满足印度提出的目标，也无法使印度 GDP 增速突破 6.5%。“老印度”当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经济效益低下、制度老化和技术含量低等问题亟待解决。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indian-economy-gdp-growth-capex-global-market-share-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9073549/>

编译：常家碧

10、《报业辛迪加》：欧洲如何确保关键材料稳定供应

12月20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国际环境政策部主任约翰娜·西多（Johanna Sydow）的文章《西欧如何确保关键材料稳定供应》。文章认为，欧盟已经意识到关键材料对于建设可持续未来的重要性，但是却忽视采矿业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破坏环境的问题，这将损害欧盟为缓解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3年3月宣布欧洲关键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 Act），并指出主导未来清洁能源技术竞赛已开始。欧盟计划通过关键材料法案与资源丰富国家建立互利伙伴

关系，推动关键材料开采、加工和回收等战略项目向前。但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却将对人权和环境的监测外包给私人评级机构。事实证明欧洲在关键材料开采过程中对人权和环境保护不足，如宝马公司的钴供应商在摩洛哥运营的一座矿山被发现向附近水体释放大量砷，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欧盟需更有效的工具，引入更加严格的尽职调查机制，防止损害环境和侵犯人权事件发生。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must-improve-mining-industry-human-rights-and-environmental-record-by-johanna-sydow-2023-12>

编译：林幼玲

11、《外交学人》：日韩关系中的分与合

12月23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詹姆士·贝冢（James Kaizuka）撰写的文章《日韩关系：团结的力量与分裂的危险》。文章认为，虽然尹锡悦与岸田文雄执政后的几个月内迅速修复“安倍-文在寅”时期日韩间的艰难关系，但两位现任领导人较低的民众支持率以及继任领导人可能带来的政策不连贯性使得日韩关系存有隐忧。在日韩关系中，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难以处理。当前，尽管该问题仍未解决，但日韩在世界问题上的价值观大体保持一致。两国在各自政策文件中都支持类似价值观，在涉及海外援助、国防和外交政策等领域，都强调自由和人权重要性。作者认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是东

亚地区积极的发展方向，但日韩领导层的脆弱性显示双边长期和解的重要性。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2/japan-south-korea-cooperation-strength-in-unity-danger-in-division/>

编译：李成琛

12、《报业辛迪加》：萧条期的德国

12月19日，《报业辛迪加》刊登德国柏林赫蒂学院社会学教授赫尔穆特·K·安海尔（Helmut K. Aaheier）的政治评论《萧条期的德国》。作者在文中回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被视为稳定的灯塔。但现在德国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对国家未来态度消极。2023年德国经济低迷，而2024年也面临预算危机。如《法兰克福汇报》所总结的，第一，经济方面，德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几乎没有本国商品的新市场出现，同时“技术恐惧症”则拖慢数字化趋势，投资和资本市场疲软；第二，社会层面，德国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监管过度、官僚主义过多，劳动力短缺，同时面对破碎的移民制度、住房昂贵、能源价格过高等问题。但其优势在于，德国的工业核心受益于人工智能；制药业正在恢复昔日实力；而中小型企业仍然具有相对的韧性和创新能力。作者总结，这些问题可以归之于新冠肺炎、乌克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移民激增以及中东冲突，而最核心的是在经济强劲增长期内，政府变得过于自信而无视条件正在变化等问题，

通常采取渐进措施而非推动急需的改革，因此，长期固步自封导致其未能为当今世界局势做好准备，且执政联盟未能采取果断行动只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目前的执政联盟中，社会民主党只注重迎合基本盘。绿党的改革愿景与民意日益脱节；自由民主党则重复“不增税”和“限制公共支出”的口号，同时坚持债务刹车，即宪法对新借款的限制。联盟执政前两年的政治成绩单令人忧心。从社会角度看，随着罢工和示威运动越来越普遍，政府团结多数德国人的共识已经严重削弱。目前，德国政治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民调支持中不断崛起，如果大联盟想要继续掌权并改善其惨淡的记录，朔尔茨必须采取行动。作者最后总结认为，朔尔茨政府应努力就三个关键问题达成共识：不推出任何新的社会计划，并将当前计划的支出增长限制在通货膨胀率范围内；实现公共行政现代化；倡导债务刹车并对公共投资采取更灵活的态度。虽然这些改变可能并不大胆，但如果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ermany-gloom-y-political-economic-prospects-2024-by-helmut-k-anheier-2023-12>

编译：来瑛

13、《政客》：巴以冲突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存在命名分歧

12月19日，《政客》网站发布记者马特·伯格（Matt

Berg)、乔·古尔德(Joe Gould)和安东尼·阿德拉格纳(Anthony Adragna)的文章《为什么对巴以冲突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存在命名分歧?》。作者认为,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呼吁以色列减少在加沙地区密集的军事行动,但他们的措辞往往不同且含糊不清,包括“可持续停火”“共同且永久地结束暴力”“立即降级并停火”“双边协商一致的人道主义停火”。其中,“双边停火”的措辞最受欢迎,被数十名美国民主党议员采用。这种用语的模糊使政治家们能够在不彻底疏远美国在中东亲密盟友的情况下,倡导中东地区某种表面上的和平。这导致的问题是,人们并不清楚议员们在倡导何种措施。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对巴勒斯坦平民造成的伤亡越来越明显,要求停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停火的措辞却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有些似乎是凭空捏造。此外,如何长期结束该地区暴力的关键细节也被一些政治家忽略。目前在美国,一方面,争论和外界压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参议院的现状,即不论停火的定义是什么,除了少数民主党人之外,所有参议员都还没有签署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众议员 17 名进步派议员签署决议敦促拜登政府立即“呼吁并促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降级停火”,并呼吁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未具体说明战斗是否应该无限期停止。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12/19/israel-hamas-cease-fire-names-00132566>

编译: 杨奕萌

14、《外交政策》：哈马斯会成为全球性威胁吗？

12月19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情报与安全咨询公司苏凡集团研究部主任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Kadira Pethiyagoda）的文章《哈马斯会成为全球性威胁吗？》。文章认为哈马斯可能从地区性威胁转变为国际威胁的迹象，尤其从最近在丹麦、德国和荷兰逮捕7名涉嫌准备对欧洲犹太机构发动恐怖袭击的个人后可见一斑。同时，美国也对提高的恐怖主义威胁水平发出警告，欧盟也担心战争在社会中引起的两极分化和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会使欧盟成员国有遭受恐怖袭击的巨大风险。文章认为，从外部看，哈马斯在西方维持长期的筹款和宣传网络，而巴以冲突后阿拉伯世界对伊朗的支持日益增长，伊朗可能会对其提供除资金、训练和后勤支持，甚至像对真主党那样协助该组织发展对外行动攻击网络。此外，阿拉伯世界的民众似乎也开始支持伊朗政权。从内部来说，哈马斯在10月7日冲突爆发后，可能已经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周边以外的目标，呼吁对以色列的盟友，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进行攻击。文章引用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托雷·哈明（Tore Hamming）的观察认为，巴以冲突的长度、以色列在加沙的进攻的规模和强度、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度都将一起与平民死亡数上升的因素被哈马斯高层作为其是否发动外部攻击的决策考量。文章最后警告称，哈马斯的宣传在西方公众中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年轻一代和许多大学生），同时其宣称其要将战争扩展到加沙之外的地方，威胁

到以色列及其在全球的支持者，所以情报和安全部门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2/19/hamas-terrorism-threat-global-europe-germany-arrests/>

编译：朱凯泽

15、《国会山报》：美元化解决不了阿根廷的财政问题

12月19日，《国会山报》网站刊登乔治梅森大学墨卡托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马特奥·米勒（Stephen Matteo Miller）的文章《美元化解决不了阿根廷的财政问题》。文章对阿根廷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的美元化政策进行分析。首先，几十年来，非官方的美元化一直是阿根廷的现实。由于比索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美元和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成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对国内高通胀的回应。由于非官方的美元化通常涉及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与黑市或平行市场之间的持续争斗，因此，官方美元化能够减轻本国的通胀压力。然而，这一进程也会导致政府无法征收货币铸造税。不过，阿根廷的货币铸造税早已耗尽，因此，从净值来看，美元化似乎可行。其次，尽管官方美元化可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且增加税收、减少支出的财政改革能够解决阿根廷不断增长的债务问题，但政治因素可能会破坏此类改革。以津巴布韦大约15年前因政府财政问题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例。随着津政府的官方美元化进程和执政者的权力分

享机制，该国实现财政盈余，经济开始复苏。但由于 2012 年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权力分享机制失效，此后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再次陷入困境。文章总结称，虽然美元化可以减轻阿根廷的通胀压力，但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政策制定者最终选择哪种货币机构，改革工作都应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来结束政府赤字肆虐的问题。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4366024-dollarization-wont-solve-argentinas-fiscal-problems/>

编译：叶如静

16、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对华投资正在减少

12 月 18 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在其网站刊登其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所撰文章《目前美国对华投资正在减少》。文章观察美联储最新文件后认为，拜登治下，美国对华投资数量有所下降。美国对华投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诸如持有外国公司大额股份等的直接投资，二是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证券投资。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相当稳定。2016 年的存量为 1670 亿美元，2022 年为 2160 亿美元。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投资存量在 2022 年比 2016 年高出 120 亿美元。但数据表明，在证券投资（投资组合资本）方面，资本正大量回流美国本土。2022 年，美在华证券投资真实存量近为 9100 亿美元，比 2021 年减少 2600 亿美元。文章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在限制对华投资方面的不作为，尤其是在拜登

政府任内。虽然拜登政府的表现好于特朗普政府，但迄今为止，美国监管机构并未采取具体行动来限制对华投资。文章强调，在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情况下，国会有责任就科技领域采取行动，继续约束对华投资，维护国家安全：一是提升透明度，密切监控美国在华资金动向；二是阻止美国投资在关键领域帮助中国获益，限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与投资，并阻止中国在美展开收购行为。

<https://www.aei.org/foreign-and-defense-policy/less-american-money-in-china-for-now/>

编译：谭燕楠

编译：叶如静、朱凯泽、谭燕楠、来瑛、杨奕萌、李成琛、林幼玲、常家碧、雷文聪、李达镐
编译：刘嘉雯、石佳怡、赵金钰、和怡然、高隆绪、李一磊

审核：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苗争鸣、周武华